

中苏经济体制改革 研讨会论文集

刘国光 主编

中苏经济体制改革 研讨会论文集

刘国光 主 编

李京文 副主编

经济 管 理 出 版 社

中苏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论文集

刘国光 主 编

李京文 副主编

*

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邮政编码 100836)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总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 6.625 153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80025-431-3 / F·335

登记证号:(京)029号

定价:3.50元

前 言

应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阿巴尔金院士等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了以副院长兼经济学科片领导小组组长刘国光教授为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者代表团，于1990年2月12日至26日访问了苏联，和苏联经济学家联合举行了“中苏经济体制改革学术研讨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刘钧德、曹林章、厉璠等三同志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刘国光教授和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沙塔林院士共同主持。刘国光教授和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研究院院长阿甘别吉杨院士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参加研讨会的两国学者、专家共60多人。其中在研讨会上作系统发言的，中国方面有以下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领导小组副组长、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京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领导小组副组长、财贸物资研究所所长张卓元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领导小组成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叔莲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领导小组成员、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吉元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戴圆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学术秘书、财贸物资所物资经济研究室室主任秦毅副教授；苏联方面有以下同志：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苏联科学院市场研究所所长彼得拉科夫通讯院士，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科学院副院长卢基扬诺夫院士，苏联科学院经济和

科技进步预测研究所所长亚列缅科通讯院士，苏联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科斯塔科夫博士，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博士，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叶夫斯季格涅耶夫，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拉基茨基教授。

苏联科学院院长马尔丘克院士也到会并讲了话。阿巴尔金院士因担任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体改委主席的职务，正在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因而未能到会，但在会议开幕当天晚上，他邀请中国代表团全体同志到克里姆林宫就中苏两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中苏两国的经济与学术交流合作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

这次为期4天的研讨会引起了中、苏和其他国家经济学界、新闻界的广泛注意和强烈反响，普遍认为它将有助于推进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两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促进两国经济学界的学术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使中苏两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关心中、苏两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学者和各界人士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次研讨会上发表的各种学术观点，出席这次会议的两国代表团共同商定：由中、苏双方将两国学者在研讨会上发表的主要论文分别编辑成书，各自在本国出版。按照这个协议，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中苏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论文集》，供广大读者参阅。

本书由刘国光同志任主编，李京文同志为副主编，并由李京文、王文修、秦毅三同志组成编辑小组，负责本书的编辑、翻译、校订、出版的具体组织工作。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时间比较仓促，本书难免有不足之处，请读者予以指正。

编 者

1990年10月20日

目 录

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沙塔林院士的开幕词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教授	
在开幕式上的致词	4
苏联科学院院长马尔丘克院士的讲话	7
中国经济的十年改革和当前的调整	
..... 刘国光	9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 戴园晨	23
中国计划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 李京文	32
中国的企业改革	
..... 周叔莲	42
中国农村十年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 陈吉元	55
中国价格改革的艰难历程与光明前景	
..... 张卓元	67
中国物资流通体制改革	
..... 秦 毅	80
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 阿甘别吉扬	89

根本的经济改革：首要和长期的措施	
——苏方的书面总报告	104
苏联经济计划体制的根本改革	
..... 科斯塔科夫	135
苏联农业经济改革	
..... 卢基扬诺夫	140
基层经济环节的经济自主权	
..... 叶夫斯季格涅耶夫	146
经济改革与结构政策	
..... 亚列缅科	152
与经营多样化有关的几个问题	
..... 拉基茨基	157
苏联市场形成的一些迫切问题	
..... 彼得拉科夫	160
在改革条件下中苏之间经济合作的可能和前景	
..... 季塔连科	167
苏联的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述评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访苏代表团	181

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沙塔林院士的开幕词

亲爱的同志们：请允许我宣布在我国召开的苏中经济改革问题研讨会开幕。我想毫不夸大地说，这一次研讨会在发展苏中关系方面应当起很大的作用。当然首先是在经济方面，因为这是我们经济学家首次聚集在一起讨论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问题。

我们非常清楚，经济问题是同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其他各种“周围的结构”联系在一起，而经济在这些结构中实际地发挥着作用。因此，很自然在我们的研讨会上将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尽管如此，我号召我们大家和你们一起首先研究各种经济问题。因为我们是专业人员，我们是学者，我们的任务首先在于找到真理，假如我们还善于做到这一点的话。

我想，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坦率，我号召大家这样做，昨天我同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的朋友们进行了座谈，在那里号召他们坦率地交换意见，希望他们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希望我们自己也感到这一点。象在自己家里一样，这很重要。当然我不希望你们在保守性上进行竞赛，谁比谁吞吞吐吐的发言更多，谁将当“避而不谈的冠军”。再重复一次，这是专业人员的研讨会。首先我们应当真正地为我们的人民效劳，假如我们将研究给我们付报酬的那些问题。向我们付报酬或者应当付报酬，因为我们能指明：我们的经济向何处发展和如何发展。

同志们，我还想强调指出一个问题：我国和中国都属于强

国一级，通常都被认为是大国，这是历史造成的。它期待我们的人民，其中包括学者表现出聪敏才智和考虑问题时的仔细斟酌。因此，世界的稳定和经济体系，世界的政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苏关系发展得如何。

在我们的关系中有过不同的阶段：从友好关系到关系破裂（实际上）。现在我们开始我们关系中的螺旋线的另一圈，这时，我们开始互相理解，开始互相听取意见，但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我们合作的新时期出现了。否定这一点简直是太不客观了。在那些光荣的年代，那时我带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中文，在大学的中国经济学部学习了两年；我还记得那些光荣的时期，那时我们给中国留学生讲政治经济学课程，帮助他们掌握课程。那个时候我们的友谊至少在下层是绝对真诚的，但我不知道在上层发生了什么把戏。谁在上层玩了把戏，上帝是他们的裁判。但是我记得我们的关系。我希望，纯粹出于感情，我们年青时代的这种精神重新得到恢复（虽然我们从那个时期以来变得多少聪敏一点了，但遗憾的是，至少有些人也变得老一些了）。我想这一点是很好的，尽管这在形式上可能超出经济课题的范围，但是，正因为这样才算好。

我还想坦率地讲，现在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经受着危机时期。掩盖这个事实，至少说是不负责任的。今天我已经读了党中央刚出版的“苏共中央对第二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的纲领”。我们的中国同志刚来得及读到这个纲领。看来这也是我们一系列谈话的基础。因为那份纲领中有很大部分是关于经济体制的。我认为，特别是有一点值得我们谈一谈，至少谈谈什么叫计划市场经济。可能能找到有见地的经济学家，他们能解释这一个概念，我们则很抱歉。

全国都在探索改善自己经济生活的途径。有些社会主义国

家在想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结构，这一切都将促进他们人民过真正的好日子，促进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是一个正常的、客观的、自然的过程。我们不应该作为这个过程的旁观者，可惜我们经常是这么做的（我指的至少是我国的共产党员，我不想谈中国的共产党员，我无权作这样的评价），总之，假如用我喜欢用的体育术语，任何时候都要走“黑棋”^①。我们不该是事件的奴隶，我们不该是简单的编年史的编纂者，历史学家会做这种工作。我们应当是这样的人，即经常能想到自己是一个学者，我们应当象学者那样善于预测未来事件，至少是预测在经济方面的未来事件。我们应当善于预测我们所通过的各项决定的后果，我们应当预测做一件事情不仅是为了整个社会，而且是为了某些社会阶层。可能最初应该是这样。因为可以简单先从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各个阶层来考虑。这一点可能是这样。然而这种态度无疑是简单化了的、是非常表面的作法、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黑白颜色的。而完全是绚丽多彩的。当我们在经济方面，当然不仅仅在经济方面通过各种不同的最重要的决定时，我们应当考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

我在结束自己简短的开幕词时，感谢我们的中国朋友，感谢他们来我国举行共同的研讨会。我希望我们的会见将不仅是在事业方面是有益的，而且对我们的朋友来说从了解我国的生活的角度来看也是很愉快的。因为我们的朋友还要去考察、访问苏联。我希望，在我们会见中已经开始了的那种真正的热情在我国各地都能相随，并希望你们把这种热情带回国内去。

我感谢所有研讨会的参加者。

（王文修译）

^①黑先白后，译者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刘国光教授在开幕式上的致词

亲爱的同志们：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代表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几位与会同志的名义，对你们邀请我们来莫斯科参加中苏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表示深切的谢意。你们为我们提供了访问我们的伟大邻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可能性。我们来到这里将和你们一起共同探讨和交流我们两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和经验。

中苏两国经济学家之间的经验交流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还记得，在 1982 年我曾和柳随年、郑力同志访问过贵国，上次访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几年来，两国经济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但是今天在这里举行研讨会，到会专家人员之多，会议内容之丰富尚属首次。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 1978 年开始的，从那时以来已经有 11 个年头。我们想利用这次研讨会的机会尽可能多地向到会专家介绍我国改革以来的实际情况。此外，苏联从 1985 年实行改革以来，也有 5 个年头。因此，我建议在这里讨论既对苏联经济学家，又对中国学者双方感兴趣的问题。我想，在研讨会的基础上使我们能更好地促进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学者之间、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召开这样的研讨会，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在 80 年代，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学到了很多東西。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确立和执行了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我们应该明确地肯定，1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改革开放使生产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改善，并在探索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道路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无疑，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也有过某些失误，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许多困难有待克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从亲身经验中深深体会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不搞改革开放，中国就没有希望。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我们正在实现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第一步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当前正在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战略目标，在我国国内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否则的话，实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将是很困难的，或者完全是不可能的。

近年来，我们看到中苏学术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同志1989年5月访问中国之后我们感到尤其明显。在此访问之后，我们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的联系都有了迅速的发展。我们为这一成就感到由衷高兴，我们也非常珍惜这一成就。我们始终认为，中苏两国之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的友好合作关系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对保障亚洲和世界和平也有巨大的意义。

我们真诚地希望苏联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取得成就，我们也希望两国人民之间，特别是学术界之间的友好往来得到进一

步的巩固和发展。预祝我们的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苏联科学院院长 马尔丘克院士的讲话

尊敬的刘国光同志，同志们，朋友们：最近，我访问了中国科学院，参观了许多研究中心，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是我 20 年后第一次到你们国家。这是一个反思的时期，重新评价过去的关系，我认为中苏两国发生的事情为双方广泛对话奠定了基础。去中国之前，季塔连科同志向我谈了许多中国的情况，当时我们就感到，科学是我们首先可以开始合作的重要方面。你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进一步完善经济体制，我们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但同时还多了一个政治改革问题。因此，我们要同时解决很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科技进步问题等等，所以过渡时期才这样困难。还会有更多的困难，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很多。这就要求不断提出新思想，首先是经济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他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正处在政治改革的开始阶段，同时也提出了到 2000 年以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和各种方案。当然，政治改革要更困难些，因为人们对过去的记忆更强烈。所以，尽管从表面看没什么，但各种问题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政治与经济不可能分开。我想对经济学家说几句话，经济学家现在是最重要的人物。我很高兴在这里看到这样多经济学家、院士，包括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这些都是非常著名的科学家。这次会议不仅讨论中苏各学科的问题，也是各学科互相协作的象征。

中国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当我们在中国作客时，正

逢你们在召开科技会议。当时决定建立几十个研究所，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给我们代表团印象很深。表明你们党和国家很重视科研体制。访华的第二个印象是，当发现你们的国民经济放慢速度时，政府为了不使货币大幅度贬值，立即决定大量缩减基建，很快平衡了市场，解决生产力发展、工资、商品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快速反应措施。当然我不认为你们不存在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是你们解决问题的果断措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三个印象是深圳特区。那里在试点。我觉得很可能对发展社会主义提供许多新的东西。我们将以极大的兴趣注视中国特区的发展进程。回来后我们向中央作了汇报。

最重要的是，已经出现了两国科技合作的条件，签订了协定。我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希望在最近的将来，中苏交换留学生达到 50 年代的水平。同志们，如果我们能进行长期、紧密的合作，生活会使我们接近起来。尽管还存在某些分歧，但是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一样的。应该为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些工作要靠年青的科学家去做。我们老一代做的一切是为了让人们联合起来，首先是科学家联合起来。我们非常重视戈尔巴乔夫同志与邓小平同志会见时的谈话：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当然这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话。我们的愿望也是这样。现在正是实现我们签订的各项协定的时候。我对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合作表示满意。

希望你们在座的各位参观我们的任何研究所。在座有我们的 10 个院士，有乌克兰、列宁格勒的同志，还有季塔连科同志。

祝你们幸福，工作顺利。

(秦 毅根据记录整理)

中国经济的十年改革和当前的调整

刘 国 光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 1978 年底开始的，到现在已经经历了 11 个年头，实践中和理论上的变化都不小，遇到的问题也不少。这里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进程，可以按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三中全会为划分标志，把它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84 年 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历时将近 6 年。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展开，主要是改变了过去农村中普遍实行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及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集体经营、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方式，全面推行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改革，有效地克服了原有农村经济体制中单纯依靠集中统一经营的缺陷，启动了农民家庭经营、分散决策、劳动和经营效率与农户收入直接联系的动力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出现了全面持续发展的局面。与此同时，在城市主要是在工业企业中恢复了经济刺激机制，重新启用了奖金杠杆，并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为在城市经济中发挥企业自主经营的积极作用探索道路。

1984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第二个阶段。这次全会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确定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纲领。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使企业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改革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领域逐步开展，对生产经营管理、计划、财税、金融、价格、劳动工资、商业、物资、外贸体制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初步改革和新的试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在科技、教育领域也陆续迈出了体制改革的步伐。

1988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标志着第三个阶段的开始。前一阶段的改革使国民经济焕发出充沛的活力，但由于在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些失误，出现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秩序混乱，所以全会提出了“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的方针，从而进入了调整 and 改革并举的阶段，目前中国正处于这个阶段之中。

十年改革的探索 and 实验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在已经有了成熟的充分的理论准备之后进行的，而是在对传统体制弊端的剖析和对新体制的探索进程中逐步提高理论认识的。改革以前几十年来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大缺陷，就是单纯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研究。这种脱离生产力发展状况来研究社会主义，导致经济理论中盛行“唯意志论”和“自然经济论”。“唯意志论”表现为片面强调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加速向统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还表现在片面强调政治挂帅、思想觉悟等主观因素，而忽视物质技术基础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发展与经济变